

时代主题与中国国际战略转型

宫 力

(中共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所, 北京 100091)

[摘要]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科学评估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战略判断,引领中国国际战略实现了最重要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开始实行“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时代主题; 中国; 国际战略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0)03-0032-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际战略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建国初期,在两极格局的冷战背景下,中国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实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一条线”的联美抗苏的战略。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提出:“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从中国、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的联合抗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1](P. 151)}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判断,引领中国国际战略实现了最重要的转变:一是改变了过去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政策,由此展开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

国际战略转型的原因、背景,以及转变的过程与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外交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世界局势和时代主题 的战略判断

对于世界局势和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和调整国际战略的重要依据。世界局势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紧张和动荡之后,开始出现了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为缓和的趋向。邓小平及时、敏锐地注意到这种重大变化,逐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曾一度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断。早在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就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

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2](P.77)} 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逐步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是新形势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中国对外关系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国际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虽然霸权主义和一些地区“热点”依然存在,但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制止战争威胁的力量和因素也在增长;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动荡的各种因素仍未完全消失,但已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基于这种情况,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并且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精辟论断。

1983年 3月 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3](P.25)} 1984年 2月 19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时,公开对中国过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说: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 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4年 2月 22日邓小平又说:“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中国至少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4](P.50)}

经过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于 1985年 6月 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详尽地阐明了他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提出了新的见解。

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

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5](P.126-128)}

1985年 9月 14日,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再次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对战争的判断和采取的政策比过去更妥当一些。现在不仅西欧在一定范围内采取独立政策,东欧也在一定限度内采取独立政策,这是十分可喜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作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本世纪战争打不起来,下个世纪和平就更有希望。”^{[6](P.334)}

邓小平关于新的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分析和结论,为中国树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并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排除干

扰,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首先把经济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在此基础上,他经过缜密的思考,又提出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两大命题。

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P.285-286)}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进一步指出,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7](P.96)}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8](P.105)}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我们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的政策与阁下一样,是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这就抓住了要害。”^{[6](P.387)}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概括为“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些科学的论断成为中国决策层认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二、实行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际局势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由于摆脱了越战的包袱,实力有所恢复和增强,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提出了“重振国威”的口号,增加军费开支,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志在从苏联手中夺回争霸的主动权,为此不惜在地区“热点”搞“低热度战争”,从而加剧了国际间的紧张局势。而苏联由于陷入阿富汗泥潭,四处伸手,又力不从心,逐渐从扩张的顶点衰落下来,失去了战略优势,由此形成了美苏对峙转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国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占了上风。

由于美苏角逐的战略态势出现了变化,长期紧张的中苏关系也出现了缓解,这一方面使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也使邓小平感到,中国作为国际格局中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块头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苏任何一方,都会使国际战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国际局势的稳定,而且对中国也不利。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做出新的战略决断,及时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不挂牌的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有所调整。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支持任何一方去反对另外一方,更加强调发展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

中国在与美国拉开一定距离之后,仍然从战略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虽然此时中美关系的基础已不再是共同对付苏联,中美在台湾问题上也有尖锐的矛盾,但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在维护世界稳定、发展两国经济以及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因此,在中美关系处在困难的时刻,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为使中美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美方进行了一番意志的较量和磨

合,并相继采取了一些恰当的措施,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并详尽地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9](P.415-416)}此后,中国在同苏联举行副外长级磋商的同时,声称不与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22日,中国外长黄华在会见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尚未正常化,这里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主要是指美国而言。

随后,在1982年9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指出了中国外交调整的方向。他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后一段话显然是针对前一段的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产生的摩擦有感而发。最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在提出党和国家在80年代的主要任务时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10](P.3)}由此点明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根本目标是为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为适应新时期的新情况,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方针在十二大之后将更加强调“独立自主”,

不再同任何国家结盟或结成战略关系。由此出发,今后同美国的关系将会拉开一定距离,不再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去对付苏联。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将发展经济建设作为解决一切国内外问题的基础,中国将避免同苏联的关系过分紧张和恶化。当然,在苏联把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论变成行动之前,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并不完全是等距离的(虽然胡耀邦在报告中把他们同称为“超级大国”),事实上,在强调“独立自主”的总前提下,中国重视中美关系仍然甚于重视中苏关系,这除了中国此时仍对苏联怀有戒心之外,还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象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当然也是一种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中共十二大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中得到确认,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一项基本国策。这部宪法的序言指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11](P.218)}

宪法中有关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些规定,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保持世界格局的战略平衡,更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做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

邓小平在总结这一历史性的战略调整时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

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他认为“只要坚持这样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5](P.126-128)}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深远的战略意义。

三、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邓小平 1977年复出后,十分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向,着眼于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的观察,尤其是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基本国策,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引进发达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在同邓颖超一起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回顾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表达了急起直追的愿望。他说:“我们损失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相信中国人是聪明的,再加上不搞关门主义,不搞闭关自守,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末,我们就是有希望的。如果不拿现在世界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创造条件,努力奋斗,恐怕就没有希望。我们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要搞科研,搞自动化。”^{[6](P.43-44)}

其次,邓小平大力提倡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思想相互呼应,终于奠

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重要基础。早在1977年5月,当时邓小平还未正式复出,他就告诫人们虚心记取长期以来“闭关自守”的教训。他指出:“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6](P.27)}1978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12](P.166-167)}此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实行对外开放以带动中国经济腾飞的思路已日趋明确。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对外开放和走出国门的尝试。据统计,仅1978年,即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个国家。^{[13](P.158)}

邓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已经大大落后了,其差距至少在15年至20年之间。1978年9月8日至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国庆三十周年活动。他对金日成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6](P.76-77)}的确,中国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因此,中国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必要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另一方面,国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时机,许多工业国家正期待着中国打开巨大的市场。从1974年起,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社会呈“滞胀”状态,为此,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为闲置资本寻找出路,这就为中国吸纳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提供了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进一步号召要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上印发了谷牧出访西欧的报告,引起与会者注意。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提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我国十分有利,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

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这比关起门来样样靠自己从头摸索,要快不知多少倍。^{[14](P. 331)}

同年 9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明确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上来。^{[15](P. 605-606)}这种转变的实质,是使中国的发展融入国际社会。

在上述背景下,1978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确立了改革开放路线,开始了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9年 4 月,邓小平对广东省委提出的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表示支持,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6](P. 117)}邓小平向中央建议批准广东省委的这一要求。1979年 6 月 6 日,广东省委起草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 月 9 日,福建省委根据广东的报告也起草了《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某些外国厂商直接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1979年 7 月 15 日,中央批转了两省的报告,明确提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1980年 3 月,中共中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这两个字的改变意义深刻,因为出口特区是借鉴外国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出发点主要是对外贸易,是单项性的开放;经济特区是综合性的,是兼工、商、住宅、旅游等事业为一体的全面开放。1980年 8 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经济

特区。1981年 11 月,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行法规,实际上也批准了厦门经济特区的设立。^{[16](P. 171)}

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中国南方毗邻香港、澳门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打开了突破口。

1984年 1 至 2 月,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的特区,又于 2 月 11 日至 16 日视察了上海。^{[6](P. 277)}

1984年 2 月 24 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他这次南方之行之后的一些重要的思考。他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17](P. 51-52)}

邓小平的这次重要谈话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4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最后形成了《纪要》,提出了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的意见。5 月 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的《纪要》。这样,进一步开放沿海 14 个港口城市的重大举措正式启动。

随后,进一步开放开发海南岛的设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1987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对外透露了中国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消息。他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

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8] (P. 239)}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的议案》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海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1个省,同时作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终于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最终形成了从南到北连接在一起的广阔地带。中国的对外开放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进入1991年,中国历时两年多的“治理整顿”,包括降低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巩固已实行的各项改革措施等,也已取得初步成效。虽然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中很多深化改革、深层次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甚至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但经济发展的势头毕竟已初步得到恢复,从而为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

在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内政与外交的联系更加紧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更为明显。按照邓小平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国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在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初步达到人均800美元的小康水平,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与接触并重的双轨政策,以及苏东巨变的复杂国际局势,如果中国发展的速度太慢,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出现经济衰退,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对中国又是一个机遇。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逐步形成了以开发上海带动长江流域发展,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

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19] (P. 366-367)}

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切下,开发浦东的战略开始实施。1992年,中国正式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五个沿江城市,同时开放哈尔滨等四个边境、沿海区省会城市及十一个内陆省会城市。由此初步形成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

中国对外开放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外开放战略的稳步实施使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保守心态,从而加快了同世界潮流融合起来的速度。由于中国有了进一步同世界接轨的强烈愿望,由此促进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不仅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的稳定,也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大国面对新的国际形势,重新考虑和确认新的共同利益基础。由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在寻找和确定这种利益基础方面,更加现实,希望把中国对外合作关系,更加深入地引入互利互惠的轨道。而世界大国在明显的经济利益的吸引下,对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持肯定和欣赏态度,从而使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保持了合作发展的势头。

四、结论

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引领下,中国开始全面融入世界,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

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使中国突出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特色,在改善了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正常的关系,从而成功地在美苏争霸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增强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此后中国的对外战略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可以说,这是中国对外战略最具深远意义、最为成功的一次转变。

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外交前几次的战略调整,因为,不同时期的不同战略选择有其不同的国际条件和历史背景。而要真正实行不结盟、不打牌、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全方位和平外交,至少需要有以下几点必备的条件:首先,具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所必备的实力和对外开放的决心。其次,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际社会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第三,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以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来观察和面对世界。最后还有一个洞察机遇和把握机遇问题。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仅具备这几项条件,而且不失时机地把握住了历史机遇,科学地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成功实现了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型。这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和苏联在内的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发展正常关系,有利于为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此出发,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由于中国领导人明确指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据此,中国在1985年主动裁军100万,并建议所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是一个和平的力量。

其次,由于中国国际战略的转变,中国切实把发展问题和对外开放提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抓住不放。正如邓小平所说:“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5](P.126-128)}为此,中国一方面在国内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努力沟通南北关系,倡导对外开放,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再次,中国在国际环境日益改善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进一步增强世界和平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邓小平所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0](P.158)}在独立自主的“不结盟”、“不打牌”的对外战略指导下,中国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更加成熟,并公开宣布,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对一切国际事务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同发展国家间的正常关系区分开来,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由于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引领,中国国际战略成功转型,对外开放大格局的确立,中国同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互补已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基本事实,从而使中国对外关系置于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 [1] 康绍邦,官力.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 [2]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

- [3] 邓小平.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A].邓小平.邓

- 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5]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邓小平.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
- [13] 张树军.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14]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A].李先念.李先念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5] 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16] 黎青平.毛泽东邓小平与对外开放[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 [17] 邓小平.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8]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9] 邓小平.视察上海时的谈话[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0]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A].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齐琳)

· 学术信息 ·

“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

在发表于《史学月刊》2010年第1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一文中,作者牛可指出,冷战时期美国国内变化的诸多方面均可置于“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概念之下加以认知和讨论。“国家安全国家”是伴随冷战而出现的美国历史上全新的事态。在冷战爆发和演进的同时,经过战后初期关于国家安全组织体制的大讨论和持续进行的政府机构的重组,美国的政府组织体制,乃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国家安全”理念之下,美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扩张政府对外事务和军事部门的规模并提升其重要性,在政府组织体制和政策制定上达成政治、军事、外交、内政、经济、情报等各职能领域和部门之间的集中统筹和全面协调,并对国内的人力、经济、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实施充分动员。内在于“国家安全国家”的范畴,或者与其相连带的还有其他一些重要趋势,包括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权力扩张(所谓“帝王式总统”),常规外交职能部门(国务院)专业外交官实际影响力的下降,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的规模扩大、影响力上升,以及政策事务中保密规则的强化等等。“国家安全国家”的创生和扩张,为美国制定和推行冷战政策创造了基本的国内政治条件和制度框架,也是美国在全球主义对外战略和政策之外对冷战做出反应的基本方面和基本内容。进而可以说,对内部组织体制和动员机制的变革和建设,是美国冷战“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更广阔的美国历史长期运动看,“国家安全国家”与“福利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形成20世纪美国以“大政府”为方向的国家构建长期运动的三个基本向度。

(车力)